



贵州省苗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

论文资料集 (上)

主办：贵州省苗学会

协办：铜仁市苗学会

松桃苗族自治县苗学会

(2016年11月)

目 录

“两思”苗裔源流暨风俗考略	1
“东蒙”伏羲太昊与苗族	9
辅处苗族的历史来源及形成研究	32
黄平是王且	41
三苗与古三苗考析	53
历史上印江苗族与周边苗族之渊源关系及其生存环境选择	63
西南边疆民族认同的多元化选择	70
中短裙苗族习俗的变迁	85
浅谈印江古代苗族聚居洞寨现象及其政治变革	90
雷山苗族农耕文化纵横谈	96
苗族传统斗牛场选址与节日斗牛	104
雍董地苗王坟考察报告	114
苗王坡探秘	122
论铜仁市石岷、石龙起义对武陵山区苗民的后续影响	125
黔东南州苗族武术起源和发展状况研究	132
苗族爬花杆习俗调查与研究	138
试析历史上黔东南苗族的抗生本能及其自保之术	142
瓮安县苗族习俗及文化探索	148
浅析苗族在法国的发展及影响	151
且兰拓荒黔中地 五溪湖畔诵史诗	157
安顺红崖天书系苗族古文字的历史视角考证	168
对苗族称谓及苗族刺绣银饰蜡染等文化艺术之我见	178
喇叭苗历史文化研究	182
喇叭苗的历史文化韵味	198
开辟苗疆与改土归流关系考	202
苗族古典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10
山海皆故园——苗人首县毛山初探	213
给老酸汤注入新活力	221
黔西南苗族细酸菜传统工艺与发展研究	224
浅析都匀苗族饮食文化	227
丰富多彩的美国苗族服饰	230
广西隆林苗族服饰文化研究	236
惠水苗族枫香染及文化内涵	243
苗族盛装传承	249

黔西北白苗服饰装饰图案文化内涵考析.....	254
浅谈三穗南部苗族妇女服饰文化内涵及传承与保护.....	261
从都匀坝固苗族服饰、银饰探寻其迁徙之源.....	267
苗族建筑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270
苗族特色宅院的打造升级及面临的困境.....	276
苗族文化的开发利用研究.....	280
苗族传统婚恋是和谐社会的产物.....	286
从家谱资料看贵州少数民族的特异婚俗.....	290
黔西北小花苗婚恋习俗研究.....	299
丽江市华坪县苗族婚俗文化.....	305
百里杜鹃苗族丧葬文化调查.....	310
存在与超越：苗族丧葬仪式的生命美学意蕴.....	315
广西隆林苗族丧葬文化研究.....	325
苗族丧葬文化研究——“鞞虐”.....	330
威宁苗族丧葬风俗浅议.....	332
六枝特区生态博物馆区域内长角苗支系丧葬礼仪文化.....	337
雷公山苗族独特的丧葬文化.....	345
苗族丧葬习俗.....	352
浅谈苗族丧葬文化的奇异之处.....	356
毕节苗族传统节日的现实意义和传承发展.....	360
苗族节日文化研究.....	366
如打造贵阳苗族传统节日“四月八”这张名片.....	378
神秘多彩的摆榜苗族节日习俗概述.....	384
苗族走亲节文化内涵与价值研究.....	390
苗族古歌的文化内涵探索.....	395
苗族古歌与族群认同.....	402
苗族古典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414
浅谈安顺黔东方言苗族诗（山）歌礼仪文化.....	417
浅谈苗族的贾文化.....	426
浅析惠水苗族山歌的文学元素.....	429
史诗《亚鲁王》的语言文化价值探微.....	436
威宁苗族民间歌谣初探.....	441
苗族与布努瑶创世史诗比较探讨.....	450
三十五年的坚守.....	457
从语言接触看楚语与苗语的关系.....	463
略论苗语在语言环境中词汇音义的多样性.....	467
漫话“爱”的古韵.....	473
关于苗族语言文字的几点思考.....	476

浅析新形势下学习石门坎苗文的重要性和方法.....	484
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研究述论.....	492
基督教典籍苗译与黑苗的文化生活.....	498
苗族歌整中的典故.....	507
苗族姑妈话研究.....	518
试论苗语翻译中的易与难.....	537
对雷山苗族飞歌的探讨.....	545
黔西北苗族民歌的种类研究.....	553
盘县马场大筒箫.....	560
苗族芦笙辞刍论.....	563
云南苗族芦笙文化初析.....	570
水城苗族芦笙文化传承初探.....	574

“两思”苗裔源流暨风俗考略

秦礼显^①

早在殷商至春秋战国间的古代，今整个贵州地域，及至滇东北、川东南、湘西、桂北等广大地区，皆被历代官方统称以爨氏为主体的“蛮夷”之地。即世居这一地带其后的苗族、土家族、彝族、侗族、壮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先民的聚居地，也就是古夜郎国地域。而唐初所置今印江之古思王县、思邛县地（简称“两思”地），则正是汉初末代夜郎国王兴的隐居场所的核心地区之一。他凭借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区的战略纵深地带为依托，以邛水河流域成百个大洞穴为居室，以长期躲避官方围剿，与之斡旋达数十年之久。汉·成帝 河平二年（前27年），牂牁郡太守陈立灭夜郎王兴于思邛水（时称邛水），亦并非以武力征服，而是以邛邑君诱召“因数责而断头”。本文主要将其“两思”地的苗裔民族源流与习俗考略秉述于后，以与同道共飨之。

一、苗裔民族源流

（一）“两思”苗裔出自“鬼方国”。

“两思”苗族的历史渊源，总体说皆出自于“鬼方国”，而后称“夜郎国”或“牂牁国”。《唐书·南蛮传》曰：“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又乌蛮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明史·土司使》：“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笮、僰、爨之属皆是也。”可见“两思”苗民源自“鬼方”，即“鬼国”，及其衍貽后的“夜郎国”与“牂牁国”。

印江则是“鬼方”的主源地，多处都以“鬼”字冠其名。如甲山西岩寺后名“鬼沙沟”，凯塘有“鬼溪”，朗溪有“鬼寅洞”、又名“鬼州”，合水有“平鬼洞”，罗场有“鬼石口”，凯望有“鬼冶洞”、又名“鬼旺”，沙子坡小郎坝后面有“鬼崖山”等等，“鬼方”便因之而名。

（二）苗裔渊源与爨氏。

苗裔渊源，在古夜郎境有二说：其一，为“犬戎之寇”说。据《后汉书·南蛮西南蛮传》第七十六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即征伐不克。乃诊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古重量单位，一镒合旧制一斤二两五钱），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槃

^① 贵州省档案学会第四届理事、副研究馆员，印江档案局退休干部，现为贵州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诗词协会会员、中国书协考级专业二级书法家等。

瓠。’下令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皇帝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以，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疑指黔南地之郎溪石屋洞）。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立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好入山壑，不乐平。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其二，有“竹王三郎神”之说。亦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第七十六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乃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前110）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性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牁太守吴霸以问，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初，楚顷襄王时（前298-263），遣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铜仁府志》载，且兰乃铜仁至江口地），桡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以且兰有桡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公孙述时，大姓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从番禺江奉献。”

足见，时“两思”地的上述四姓蛮夷，多源自这一时期。但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多令史学界疑惑，其所云之爨氏为众苗蛮祖先则多可信矣。

（三）爨氏即苗族先民。

综上述述，在古夜郎地，苗族应当是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据载，早在远古之殷商时期，在黔北地区即有谓之“爨”的国名存在，故有爨氏部落聚居。其民族为“罗罗”，亦名“鹿卢”。《周书》有“庸罗羌，唯卢濮人会周师以伐商”之说。说明爨氏与焦庸诸族成为南中地区得姓最早的巨姓之一（庸即古庸州，在今之黔江、彭水一带）。其最先首领爨骧，其后为爨瓚，生子二，长震，次玩。震据西，玩据东，成为南中爨国之望族。历代封建王朝，都统称以爨氏为祖先的西南各少数民族为“蛮”，即所谓：“爨蛮、南蛮、荆蛮、南夷蛮或土人。”

另据载，爨又有东、西爨之分，蛮亦有黑、白之分。裕贵者为“黑”，亦称“乌蛮”，据其东，即湘、鄂、川、黔毗邻地区；低贱者为“白”，亦称“白蛮”，据云贵边以西。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宁州至梁末为爨所据，则牂牁（黔东）、兴古（黔西）二郡，此时盖以入爨氏也”，也即“蜀、汉罗甸国火济氏之后裔祝明氏也。”西汉初，祝明氏之二子怯，怯之长孙“孟贲者事邛君”，即“邛邑之君”（其后之思邛县）；怯之次孙，即“孟获”，就是三国时诸葛亮南征黔西地时“七

擒孟获”故事中的显赫苗蛮酋长人物。

又据《续编宁州荆州刺史爨龙颜碑按语》载，爨龙颜，名罗士德，因军功被封宁州刺史加邛都侯，领建宁、牂牁、平蛮、夜郎、朱提等十五郡。元嘉廿三年（450）龙颜去逝，其后起之嗣为李、盖二姓苗所据。据传诸葛征南越途经牂牁邛水地时，孟超便迁至湖南沱江（凤凰）一带定居，其后裔又迁回思邛故地者。今在印江沙子坡竹园村及板溪的小毛寨所居孟姓即是孟超之后代，即印江苗裔原住民也。

（四）苗裔分类及特质。

按其苗蛮种类，则有裸继、狎家、狃佬、牂黄、僰人、洞人、蛮人、八蕃，杨保，龙、宋、蔡家，并诸苗三十余种。其中：以苗名者，又凡二十余种。在新贵者，曰花功；在广顺者，曰：克、孟、拈、羊；在乡宁州者，曰青苗。

诸苗之中，惟兹四特质：多纯朴，畏朝廷，急输将为主人服役，不敢玩；其次，则龙里之白苗，思州（黔东北地域）之短裙苗，贵定之平伐苗，烂土坝之夭苗等，或顾役，或力作，虽娶、葬无礼，夷俗类然，尚无聚众抢劫，出入无害者。

居思州者，如：“罗罗”，即“鹿卢”，有黑、白二种，杂处，俗尚鬼，故又名“罗鬼”。多据今黔东南至石阡、洋溪、朗溪一线，性狡，多贫。

“牂黄”，亦名白杨黄，散居于今黔东至铜仁、石阡与“两思”地域。地处万山之中，荆壁不涂，门户不扃，出入以泥封之，婚姻、丧事以犬戎相遗。

“龙家”，虽播州之裔，与宁夷、思邛、古达意等地兼融，善石工，好深山林，居屋星散，力单渐化。“宋家”、“蔡家”，则楚子伐宋、伐蔡，遂窜“两思”夜郎，帝王之胄，遂为九种蛮夷。（以上摘自《贵州通志·风物志》）

（五）“两思”苗蛮民族的衍貽。

在古代，住在这些地域的先民，多凭借其广阔的深溪峡谷与原始森林资源，过着以游猎、游鱼为主体、部分兼耕牧的生活，并延续千百年的漫长历史，其习俗亦必然趋于古老与古朴。正如太史公在其《史记》中所云：人“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两《汉书·西南夷南蛮传》说得更为明析：“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好入山壑，不乐平”；“其后滋蔓，号曰：‘南蛮’”；“巴郡南郡蛮（即古黔南地之‘两思’及周边地区），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暹氏、相氏、郑氏。皆出生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即赤水河流域），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即今乌江之古牂牁江流域）。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今印江天堂以北及木黄、合水等地区的尹、傅、罗、吴、谢等姓，便是在赶苗托业时期，由蜀、楚、赣等地徙迁来黔南地的“南客”。如：合水高寨的罗、

吴、石三姓苗民被从江西南昌府新建县杉木溪赶出后，聚会道途，共著《聚散诗》一首，文曰：“平地干戈闹如蛙，皇兵赶散各天涯；马扶太子麒麟保，永复麒麟丹桂花；一户分为百万户，百户分为千万家；逃散记得诗八句，是我儿孙永不差”，以便后嗣理其宗。

众所周知，三国时蜀国武侯诸葛亮率军首征水西（今水城等地）蛮苗时，有“七擒孟获”的故事。水西苗蛮被征服后，其兄孟超便东迁至古黔南地。继后诸葛亮又率部东征，并进击南越。其大兵进驻沿河以东时，筑墙以护，号曰“城子头”，今史迹犹存。蜀军跨过乌江即牂牁江后，从秀山、酉阳界进入“两思”的“龙门山”脚，有“百马饮缩独母水”源流的故事，古人便称此泉为“白马泉”迄今。蜀军翻越龙门山（今名岩山关）后，顺着邛水河（唐改名思邛水）宿营“郎王城”（后改名“思王城”，即今朗溪司），诸葛亮统帅部登上西南方高山处，在西南坡（今名土地堂半台坡）扎营，因诸葛夜梦其子，次日即在香炉岩设坛祭祀，乞祷平安。所以，清印邑诗人柳芷汀（官四川同知）在其《黔州怀古》诗中有“荒城蔓草思王县，怪石烟寒梦子坡”之句。前述东迁古黔南地的孟超则再度东迁到湖南凤凰，其后裔又有迁回“两思”地的，据池坝八十多岁的孟绍银等说，孟超后裔仍有两户世居印江沙子坡竹园村和板溪小毛寨。

二、習俗與信奉

（一）粗放的生产方式

至汉·河平二年（前27年），牂牁郡太守陈立灭夜郎王兴于思邛水后，其农耕和牧业渐之在夜郎地兴盛起来，其独特的习俗也随之而多样化。正如唐·元和《郡县志》所载：苗人多“刀耕火种，处山菁者，芟林火之，固播种，谓之刀耕火种，多本力穡”；“唱歌耕种，（如木黄七百渡的薷秧锣鼓）以泥封门”等。《思南府志》亦云：“苗人性凶勇，善奔逐，不惮渊谷，不畏猛毒。出入持刀负弩，农暇即以渔猎为事，得兽先祭鬼（山神）而后食”。可见，从明朝起，黔南地的生产方式，已从渔猎为主转变为以农牧为主了。

这种粗放耕作与泥塑封门，与当时极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两思”峡谷地带，多达百余个洞穴，皆为蛮苗土著主要居所，洞口有石墙垛遮挡，以藤栅栏作门，这是普遍现象。印江古郎溪思王城旁有一石屋洞，内镌“石室”二字，并署名“冰骨道人刻”字样；原朗溪的罗大车与罗大保两苗头在罗场老家的屋对面半山辟有一石屋洞，其炊灶今犹存；宋时思邛江的沙子坡官坝（今名池坝）的两蛮苗头任大都与任二都，曾试图称侯王一方，在其厥宅地的上下二洞间凿有洞宫一个，石“牙床”、石灶、石凳等一应俱全等，率皆半原始生活的独特实物佐证。

（二）简朴的主要生活习俗

对“两思”民俗渊源，黔布政使、安化人罗绕典所著《黔南职方纪略》亦作了更具体地阐述：“唐蒙之开南夷也，徙蜀中龙、傅、尹、贾大姓于牂牁，于是牂牁遂同蜀俗。……厥后，谢氏、越氏世笃忠贞，亦云盛矣！”

其生产方式粗放，生活方式也必然古朴，其主要表现是衣食浅陋，或者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正如黔《通志》所云：“士多兼力农，妇女恒羞踰癖，急于输将，贫不为盗。”《旧志》亦载：“民无衣帛，冬无加绵，道路之间，妇不轻出，出则擎盖障面以行。”亦正如《寰宇记》载曰：“风俗同黔中地，在荒徼之外，蛮夷杂居，语言各异。居郡（即古牂牁郡及其后思唐郡、宁夷郡）东南者，若印江，若朗溪，号曰南客（印江刀坝有南客寨），有客语，多艰馐，不可晓”。

思南知府刘廉洁，在《续修思南府志》进一步阐述了黔南地在清代以后延续下来的生产生活习俗，载曰：“稽稻，一握曰一手，两手曰稽，百稽曰毳，因有一毳田两毳田之语，盖以种别亩，不以亩什种”；衣服，冬裘多用黑白羊皮、猢猻、狼狐。乡村岁时伏腊，青、蓝袍均以粗布为之。闺中妇女，向织土布，阔二尺许，沙粗缕疏，乡民染深蓝色，资以蔽体。殷户父老均用之。今则郡城各乡暨印江一县，女工所出，致敌于江西。道光二十年（1940），郡守夏、邑侯陈（文衡）、创设访织局、觅寄籍之妇，能纺三絮，并工织者，教郡中妇女为之。二十一年，署府周、邑侯郑（士范），踵其事，由是其法传之千百人，而衣著不尽矣！”而在“两思”地服饰：苗民，头包大圆青帕，手、颈戴大银圈，身着蓝杆花边青衣，腰系青色花边百褶裙，脚蹬丝线插花鞋。

（三）古朴的信奉与祭祀。

对于“两思”苗民信奉，多尚祭祀。正如《思南府志》所云：“祭祀，年关祭祖，清明‘挂清’，月半（七月十五）‘烧包’，无祠者则以上元（正月）、中元（七月）、下元（腊月），荐祭于家。”在“两思”苗族中，祭祀主要分家祭、丧祭、俗祭三种。

“家祭”主要是祭祀祖先，及各种神社、会社、商社、斋月等诸神，由家人长者任主祭。正月初一烧新年头纸，初三烧大年纸，十五日烧元宵纸，为上元寄钱；七月十五日烧月半纸，为中元寄钱；腊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烧除夕纸，为下元寄钱。

“丧祭”，主要对家中成人以上亡者举行的祭奠活动，由乡间受传从事专行祭祀的“土老师”，人称“大法师”的人负责主祭活动。

“俗祭”，即在“两思”地民间对所信奉的诸神的祭祀活动，包括：观音菩萨、土老师主祭的傩神、灶神、土地神（或山神）、财神、风神、灵官神、祭鬼等。

过去自唐始，在思邛水流域，主要在梵净山西北部地区，古称“梵天佛地”，

但当地人常信奉的，主要是祭祀观音菩萨。大多在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朝拜佛寺，因这是观音菩萨诞辰、成道、渡海救难的三个节日。

祭雉神，主要为消灾祈福。苗民冲雉还愿，需三至五个法师配合，还要锣鼓手，备上香、纸、烛、雄鸡、牙盘供果等后便起神，有搬梁山土地、安安送米，用馓猪肉“打秦童”，以及冲雉用狗崽炮打洞、踩九洲、招魂等多出戏，被史学界称为“中世纪古戏的活化石”。

祭灶神，多在每年腊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进行两次，快到除夕了，主人便在灶台上插上香、烛，陈上一杯净茶，然后燃烧纸钱，恭请灶神菩萨返回天宫，向玉皇大帝禀报凡间疾苦，乞求来年送个风调雨顺的好年岁。到除夕之夜，仍照此祭奉一次灶神，供迎灶神返厨，保佑主家丰衣足食。

祭土地神，苗族与土家族聚居地皆信奉土地神，也称山神，主要在腊月末、正月几次祭祖先时同步进行，有时祭山神（多在高山岩阡洞内设有山神庙）时，还要背着熟猪头去祭祀，主要乞求土地山神镇山除邪，保佑地方平安，庄稼不被野物侵害等。

祭财神，是各家各户多要祭祀的一项活动，主要在正月初一的子时时刻，在堂屋大门边进行。主人将蒸煮熟的猪头、鳊雄鸡用大盆盛上，撒上盐，插上筷子和菜刀，酌上酒，备上12树长钱及一钻“四官钱”后开始祭祀。所谓“四官”，据传：在古代酉溪有严、罗、冉、唐四姓男士，因违犯王法而逃至“两思”梵净山深山老林，偶获沉香木焚烧取暖，缕缕香烟升入天宫，香惊玉皇大帝，即派差官下凡查访得知：其为严、罗、冉、唐四位善士，深居老山洞穴，靠食野物为生，还烧香敬奉天地君亲师长。玉皇大帝听后，大加赞赏，即令取四块金砖赐四人，并各封官职。他们成为富官后，便资助天下贫民渡荒年，从而被世人奉为“财神四官”。

祭风神，其主旨是干旱求雨，久雨求晴，以保年年丰收。据传“两思”地祭风神始于宋代，那时大石墩有个名叫杨东三的贤达，去核桃坪外婆家走亲，无意间顺着大圣墩岩脚走去，眼前忽见一个名叫邱家洞的洞口，两边崖壁上呈现一对酷似蛟龙的石塑物，洞口上方缕缕云烟涌入空中，他探头一晓，黑压压的深处有一亮点，并隐约伴随着轻微的锣鼓声，便叫道：“敢问洞中有人么？”忽然一股狼烟驾着一长袍白须的仙道腾空而去。惊恐之余，他便匆匆离开现场。次日，他在外婆家邀约一亲友，备上火把，去到深洞内，在道台上发现一本可呼风唤雨、镇邪除妖、隔山取酒、借脚燃火、五僧治病、仙人脱衣等《道场邪法圣经》和黑、红两面指挥旗。他俩将其拿回寨上，众人一见，长者们的倍感惊愕，都责怪他俩闯了大祸，说那是“神仙洞”，得罪了洞神仙，人们再去驱风求雨乞祭就不灵了……于是找来道场先生问卦，说是非得“杀百生”才可挽回“神

仙”对凡间村社的关爱。于是，众村民踊跃捐钱凑物，“杀百生”以祭风神，祭祀中以挥舞黑、红旗而呼风唤雨，于是“祭风神”便成了“两思”地的习俗。清代印邑诗人，《贵州通志·印江采访站》编辑柳元翹还写有“祭风神”专节。在“两思”地，全境多达数十个祭“风神”、“丰神”、“米神”、“山神”等名目繁多的祭祀洞穴，世之罕见。据载：宋·绍兴廿三年（1153），厥册司苗蛮杀百生祭风神，用人头祭百神，一直延续到明·万历间，被李皇后知晓，予以制止。因李皇后信佛，禁杀生，而改用“米粑人”祭祀。

（四）“鬼方”祭鬼。

祭鬼，这是“鬼方”苗蛮最突出的习俗。《元志》云：思民“信巫、屏医、专事祭鬼”。《府志》亦云：“苗人农暇即以渔猎为事，得兽先祭鬼而后食”。“鬼”，在蛮民中被认为是平时那些好逸恶劳、作恶多端等不干不净者，死后仍会捉弄人，变为鬼。其沿袭方式曰：“泼水饭。”多在每年除夕之夜子时时刻进行。蛮民烧完“家先纸”和“祭土神”后，在吃“团圆饭”前就要将米饭舀一勺放于瓢内，再拈些肉菜盖于饭上，到时掺上适量热水，并带上香、纸钱、烛，打着火把，去寨前十字路口进行祭祀。待纸钱快燃烬时，口念：“一柱真香，二柱明香，香烟渺渺，奉请何神，奉告何鬼：一切不干不净、没头没脑、好逸恶劳、作祟多端者，尝你水饭，（随即将瓢水饭向纸灰边泼去）远走它方，无奉太上老君，节节如律令！”然后，手作“灵官掌”姿势，画个“井”字圈符，转身离去。

中元祭鬼的习俗，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古时，佛徒目连的母亲坠入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成烈火，目连求救于佛主，佛主为他诵读《盂兰盆经》，叫他在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以救其母，后代便把中元看成鬼节，有施“饿鬼”之意。据传，“灵官菩萨”是“镇邪治鬼”的神，于是在印江一些险关要道处，多建有灵官庙。如七百渡、“龙门山”北面半山不过百来米的悬崖梯登处，上下分别建有地母庙和灵官庙，在坪洞口的关口湾、场口马鞍山脚、樊家堡的营盘山脚，及坪洞口翻山去乌罗中途的老鹰嘴、观音山、梁天坡等方圆不到十余里的地方建有如此多的灵官庙，都是为镇邪治饿鬼所为。

总之，位于古夜郎国东陲之地，也即古黔南地的“两思”县地，其先民皆为巴濮与爨氏的融合，其习俗则与深溪峡谷和山深老林相适应，加之在政治与权利上长期与封建王朝对立而战乱频乃，贫困与饥饿而导致地方习俗的古朴、浅陋与扭曲。随着新国家、新体制、新生活的建立，人们的新思维、新生活、新习惯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当然，国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是基于社会生活差异的长期性，决定了人们思维方式与习俗差异也必然长期存在。只有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大进步，各种差异性鸿沟的逐渐填平，那些消极的习俗才能自然而然地消亡，一个崭新的和谐世界才能呈现在人类面前。

参考文献:

《史记》、《汉书》、《后汉书》、《唐书》、《唐·元和郡县图志》、《华阳国志》、《水经注》、《輿地广记》、《方輿胜览》、《贵州图经新志》、《贵州通志·輿地风物志》、《思南府志》、《铜仁府志》、《印江县志》及采访口碑等。

“东蒙”伏羲太昊与苗族

石朝江^①

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为起点记叙中国的历史，形成了中华民族 5000 年的历史。其实，黄帝之前，中华民族还有一段可考的历史，即 7000 年前的伏羲太昊时代。

根据中国史籍资料记载、苗族心史传说、学人研究以及考古学资料印证，苗族源自上古的“东蒙”人即伏羲太昊部族。伏羲时代是苗族的启蒙时期，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轫时代。

一、“东蒙”名称的由来

林惠祥认为民族史中“着眼历史上民族”和“注意于现代民族”，这两种民族分类方法是并行不悖的。他说：“盖民族史内对于民族之分类应有一种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历史上之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结果便成为现代之民族，故此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接连之，不致互相柄凿……民族史若不能将历史上之民族指明与现代民族之关系，则民族之演变终不能明。故民族史宜略偏重历史上之民族，就历史上民族而分类及叙述，但亦应顾及现代民族之分类，以及其与历史上民族之关系。”^②

“太古之世，无所谓政治，亦无所谓君主，各分部落，不相统一。剥林木以为兵，用水火以胜敌，强陵弱，大吞小。不知经历若干之岁月，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③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如是说。

中国众多的文献资料记载，上古时期，在我国东部平原地带，就“始就由众部而集中为大群”，史籍将这个“大群”称之为“东方君子国”、“不死国”或“伏羲太昊部族”，专家研究考证时将这个“大群”称为“东方夷国”、“东蒙”，“东方夷族”或“东方夷人”。这与夏商周时才形成的“东夷”是有区别的。

翦伯赞、郑天挺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注曰：“君子国，不死国，相传是东方夷国。”^④

王献唐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考证了蒙(苗)人的来源，他说：“伏羲亦作伏牺……蒙阴一带，初皆蒙族聚处之所……所居之地名蒙，所处之山亦名蒙……

^① 石朝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②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 6-7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12 年版。

^③ 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第 20 页，东方出版中心，1988 年版。

^④ 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 120 页，中华书局，1962 年版。

伏羲后裔，周有密须四国，为东蒙主……知东蒙一带，固伏羲子孙旧壤也。伏羲之后，有东蒙氏……东为方名，殆对宋国诸蒙在西者而言，又知蒙为伏羲族氏矣。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①②}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皞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皞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陈（河南省淮阳县），相传是太皞之墟。春秋时期，山东还有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小国，说是太皞的后裔。相传伏羲画八卦，按伏羲与太皞向来被当作同一个人的名号，事实上伏羲是指远古开始有畜牧业的一个时代，太皞则可能实有其人。”^③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则说：“太皞，号伏羲氏。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了……传说太皞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皞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④

可以看出；翦伯赞、郑天挺认为君子国是“东方夷国”；王献唐认为蒙在东方，故言“东蒙”，伏羲为蒙族；范文澜，郭沫若认为伏羲与太皞是同一的，是居住在东方被称为“夷族”或“夷人”的祖先，而不是华夏族的祖先。他们所说的“东方夷国”、“东蒙”、“东方夷族”，“东方夷人”，都是指向 7000 多年前的“伏羲太昊部族”，而不是指夏商周时才形成的“华夷五方格局”中的“东夷”，因为伏羲太昊时期还没有“东夷”的概念，还没有华夷的区别。“东蒙”的风姓一支最早进入中原，诚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说：“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⑤华夏发祥于中国西部，黄帝后来打败蚩尤后才入主中原，夏商周时“华夏居中土，夷蛮处四方”时的“东夷”是上古“东蒙”人伏羲太昊的后裔，至春秋时全部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

在上述“东方夷国”、“东蒙”、“东方夷族”，“东方夷人”的四种称谓中，我们认为称“东蒙”最适合，苗族从古至今自称为“蒙”，“东蒙”即居住在东方的古苗人。

上古“东蒙”、“东方君子国”或“伏羲太昊部族”，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原始部落群团。该原始部族比司马迁《史记》以黄帝为开端的“炎帝、黄帝、蚩尤”早了 2000 多年。苗族源自“东蒙”即“伏羲太昊部族”，不是说苗族是“伏羲太昊部族”唯一的后裔，事实上，苗族只是上古“东蒙”人蚩尤与炎黄

^①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 297-307 页，青岛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 88 页，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③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 111、112 页，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 89 页，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

逐鹿中原的风姓集团那一支的后裔。上古“东蒙”即伏羲太昊部族也是后来华夏族即汉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我们知道，大量史籍资料记载中国经历了“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五帝”的说法很多，从古至今，人们倾向于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三皇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五帝时代则在五多年前左右。东方“东蒙”人的祖先伏羲太昊为什么进入到汉文献记载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战争促成部落联合，文明共享、文化通融的结果。炎黄蚩时期黄帝打败蚩尤，尧舜禹打败流窜三苗，春秋战国时秦国灭掉楚国，伏羲太昊的后裔绝大部分都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华蒙族的交融与和合，上古“东蒙”人的祖先伏羲太昊也纳入了中华的古帝系列。正如梁启超所说：“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①

二、“东蒙”为古苗人考证的资料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肯定苗族悠久历史的首推梁启超先生。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正式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说：“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4年，他在日本写成《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他说：“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刑法于是起焉。”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他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9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8个派系为苗族、蜀族、巴氏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9个派系中他把苗族列在华族之后，并强调“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刑法于是起焉。”

从上述可知，梁启超最先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他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有华族、苗族、蜀族、巴氏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梁启超虽把苗族列在9派系中的第二位，然他说：“齐，海国也。”海国即是上古“东蒙”人居住的东部沿海一带，齐鲁之邦。“上古时代，我中华

^① 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

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因为“东蒙”人居住在东部沿海边，才有海权思想。当然，上古时代的海权思想与近现代的海权思想不同，上古海权思想不是侵犯与掠夺，至多就是渡船迁徙，而苗族古史歌就有“海边边、造舟船”之句。梁启超说“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这就充分肯定了苗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苗族先兴，我族（即汉族）卒代之以兴，后起的华夏文化吸收了大量先前的苗黎族文化，许多史学大家都是这样肯定的。

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认为，中国“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他以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泰帝”（太昊伏羲氏）、“炎帝”、“黄帝”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泰族”、“炎族”、“黄族”。他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主要是渤海湾沿岸），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三族之中，以风姓的泰族为最古，“中国大陆，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见者即在九河（古代黄河在今河北境内的下游流域）”，而“上世华族聚居偏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实为汉族之故居。三族在上古时代更互为王，亦以泰族的兴起为最早。“遂古之王者，多在东方沿海一带”。“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当即为中国旧来土著之民，自东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长（君长）”。他强调，三族文化有不同的特色：泰族兼营耕牧渔猎，因出入于海上而“富于研究思考”，“长于科学、哲学”，凡礼、乐、兵器、律吕、算法、医术乃至政令、图典、文字皆创自泰族，其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黄族为游牧民族，故“强武而优于政治组织”，“长于立法度、制器用”，凡实用器物皆自黄帝始创，“颇似罗马”；炎族尚耕稼，一向“缺乏政治组织”，然“皆率神农之教”，又“崇幽灵、信鬼神”，“长于明妖祥、崇宗教”，故其俗“放旷浪漫”，“颇似印度”。中国文化即为三族所共建，而有先后主次之别，故谓“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早期开化的大体过程是“起于渤海，盛于岱宗，光大于三河”。

从上述可知，蒙文通认为三族以泰族的兴起为最早，“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以伏羲太昊氏为首的泰族，祖居于东方的滨海地区。泰族为中国文明之源泉，因出入于海上而“富于研究思考”，“长于科学、哲学”，凡礼、乐、兵器、律吕、算法、医术乃至政令、图典、文字皆创自泰族，其族“俨然一东方之希腊”，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这与我们在前面第一、二、三章的考察是相一致的。

蒙文通在他的另一重要著作《古地甄微》中说得更明白：“因疑苗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于是我东方璀璨之文化，滋与于斯，而展于三河。正所谓因

天时地利，而文化之兴，固自非偶然之故也。”^①他还说：“古之建帝都、封大国，皆自东而渐西，即汉族以外之民族。”^②蒙文通说的“汉族以外之民族”，即苗族也。

对于学界为什么称“东蒙”人为泰族，称伏羲为泰皇、泰帝？为什么历代易王要封泰山？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伏羲氏以豫西山地和汝水、涡水、白龟山、鲁山、舞阳贾湖和泰山为中心居邑。泰山于中国，并不是特别高的峻岭，为什么历代易姓而王，非要封告泰山呢？管仲《封禅书》谓古易姓而王封泰山的有七十二家。泰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中国的文明教化，起始于泰岱三区一带的羲皇，以泰山一带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盖中国原始民族起于东方，东方尤其泰、岱一带为其故土，木土水源，血统所出，泰山巍然，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后，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犹其祭告宗庙之义。泰山者，若祖若宗之所自出，亦犹宗庙也。’封禅的场、坛就是祭祀天、地、人祖的宗庙。羲皇缘泰山而起，为泰地之皇，故又称泰皇。以泰山为祖国，泰地之君为泰皇。易姓封王，封告泰山，旨在取得合法王天下的正统权：王者承认自己为羲皇的继承者，黎民或异族血统方始承认其政权。”^③我们认为，王大友先生的考证，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有一段精辟论述，他说：“‘《史记·六国表》：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此等方位地运之说，原不足信。然自汉以前，兴亡之迹，确系如此。”^④我们认为，《史记·六国表》记载的“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是符合中国秦汉以前之历史实际的。

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说：“夷或曰东夷，以其居于华夏系之东也。《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东夷之种属至今未明。”^⑤可看出，林惠祥没有把“夷”或“东夷”归于华夏系，或许是受到时代的限制，他认为“东夷之种属至今未明”。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上古居于东方的是“东蒙”伏羲太昊部族即古苗人，华夏族入主中原后，至夏商周时代被称为“东夷”的人们，是上古“东蒙”人的族裔，经历春秋战国，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被称为“东夷”的人们全部地融入到华夏族中去了，也可能有一些融入到百越或其他族团中去了。

杨娟、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考证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万

^① 蒙文通：《古地甄微》第1-3页，巴蜀书社，1998年版。

^② 蒙文通：《古地甄微》第7页，巴蜀书社，1998年版。

^③ 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上）第103-104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12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⑤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第49页、第5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